



# 青年为非遗创品牌 老手工艺撑起乡村“精气神”

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

今年3月和9月，江西服装学院副教授、服装设计师成昊分别带着主题为“涅槃”和“蝶”的时装秀，登上2025中国国际时装周。他提出“蜡染+”的概念，打破非遗之间不同工艺的壁垒，将蜡染、绳结、编织等融汇在同一设计语境之下，还将3D打印技术融入非遗创作。

2021年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皮雕技艺的传承人孟璐璐，创立“荒野牧作”品牌，将传统皮雕技艺与牧区自然生态元素结合，通过设计转化赋能乡村振兴，至今已实际改善农牧民家庭收入20余家，带动30余位农牧民从事皮雕皮具制作。

创立于2013年的“王的手创”品牌，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苗绣为核心，专注于苗绣手工艺的创意设计，形成“新国潮”风格。在10余年间，品牌将小众手工艺推向大众市场，带动5000余位偏远山区手艺人实现就业增收。

11月的云南大理，有风花雪月，更有多彩非遗。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等单位在此举办的2025非遗品牌推广周，汇聚121个品牌，其中61个是非遗工坊品牌，展示了其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、助力乡村振兴的显著成效。

“当下，非遗产品到了建立‘品牌’的时候了。”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岸瑛说。



成昊(右一)与画娘讨论服装绘画。



孟璐璐在2025非遗品牌推广周现场。

## 为年轻人的非遗传承 开辟一个新赛道

孟璐璐是土生土长的新疆人，小时候常跟着父亲出差，满新疆地跑，看到很多地区的牧民都会制作皮雕，“那些精美的花纹，让我着迷”。

长大后，毕业于平面设计与产品设计专业的她，在2013年成立了自己的皮雕工作室。2014年的一天，孟璐璐随团队到新疆伊犁特克斯县库热村，一位蒙古族的大娘拿来一双包了浆的红色牛皮靴给她看，“那是一双孩子穿的小皮靴，太旧了，虫咬、风化，脚后跟已经完全开线”。

“大娘告诉我，那是她的父亲——十里八乡有名的皮具手艺人——在她小时候给她做的靴子。现在，她的孙女也已经和她穿这双靴子时一样大了。大娘说，现在家里吃啥不愁，什么东西都能买到，但总想把父亲给她做的靴子修一修，然而这门家族手工艺已经失传了。”

“大娘一直重复说，好遗憾、怎么办。当时我就想，不能让这种遗憾持续下去，用我有限的精力和时间，我要和时间赛跑——不仅仅是把一件东西做出来，而是要可持续，让更多人加入进来。”孟璐璐说。

皮雕产品过去主要是牧民自用，孟璐璐认为，扩大消费群体是关键，让更多人感受到皮雕的魅力。这些年，孟璐璐带着皮雕亮相全国各地的非遗展会。在她的展位上，很少出现本人照片，皮雕手工艺人的照片是绝对主角。

2022年，文化和旅游部等10个部门印发《关于推动传统工艺高质量传承发展的通知》，提出“实施传统工艺品牌扶持计划”“提升传统工艺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”。

在陈岸瑛看来，与单品产品相比，品牌是一个更大的“目标对象”，具有更高的“能见度”，“乡村往往处在交通和信息偏远的地方，品牌有助于乡村非遗被外界看到”。“品牌建设，不但促进单个非遗项目的

多元化发展——一个项目可以细分为风格迥异的不同品牌；而且在非遗代表性项目和传承人名录之外，为年轻人开辟了一个新赛道，使年轻人的传承创新被更多人看见。”陈岸瑛说。

## 通过品牌搭建桥梁，为手艺人提供设计支持与销售通路

成昊的经历有着与孟璐璐相似的“触发”。“2016年，在北京《千年霓裳》(霓裳，即苗族蜡染的衣服——记者注)的展览上，我第一次看到来自贵州大山的苗族蜡染，我被震撼了。”回忆起10年前的一幕，成昊的眼中依然闪着光。

贵州丹寨的“苗族蜡染技艺”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，历史可追溯到唐代。早在16年前，宇航蜡染的创办人宁曼丽曾“三顾蜡染村”，带着身怀蜡染技艺却依然贫困的70多位苗族妇女走出大山，共同创业。

2017年，成昊第一次走进宇航蜡染非

遗工坊，看到一群苗族妇女坐在木凳上，用蜡刀在土布上绘画，“当时她们已经10个月没有收入，但她们在笑着，她们相信蜡染有未来”，那一刻，他决定学习苗族蜡染。

在2025非遗品牌推广周上，已经成为苗族蜡染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成昊对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说：“修炼好‘内功’，再用现代视角、国际语言去诠释，非遗一定能走出大山，走向国际舞台。”

如今，在宇航蜡染非遗工坊的带动下，丹寨县颇具规模的蜡染工坊企业已发展到20余家，蜡染产值达2000万元以上，带动700余人增收。

“王的手创”创始人兼首席设计师王丹青毕业于贵州民族大学民间艺术专业，“求学与生活都在贵州，我有大量机会深入山区的民族村寨”。在和村民的接触中，她发现，他们普遍掌握精湛的手工艺，但这些技艺的价值难以充分发挥。

“核心问题在于缺乏产品设计能力与销售渠道，好手艺难被外界看见，更无法转化为稳定收入。同时，女性群体因照顾家中老人与孩子，无法前往大城市务工。能在家门口靠手艺赚钱，成为她们最迫切的需求。”王丹青说。于是，她决定做一个“连接平台”：通过品牌搭建桥梁，为手艺人提供设计支持与销售通路。

王丹青认为，对乡村振兴来说，非遗品牌的作用在于以工艺为纽带，连接城乡。她直言，现在有所谓“非遗开发”脱离了传统手工艺，停留在图案借用等浅层，这种模式无法为乡村手艺人创造持续收入。

“真正有价值的非遗品牌，会将传统手工艺作为核心。一方面，通过培训提升手艺人技能，让他们靠手艺获得稳定收入；另一方面，将手工艺品与现代生活需求结合，搭建‘传统技艺+现代生活’的通道。”王丹青说。

## 做扎根生活、贴近大众的“传统文化传递者”

陈岸瑛说，近10年来，非遗保护成果丰硕，尤其在传统工艺领域；此外，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升，传统工艺产区如江西景德镇、江苏宜兴、江苏镇湖、云南鹤庆等，也都呈现高质量发展的态势，这都为品牌发展打下了基础。

在王丹青最早的实践地贵州台江，当地手艺人最初对他们充满了不信任——此前遇到过外地合作者拖欠报酬、中途失联的经历。于是，她采取“先预付费用、再按件结算”的合作模式。双方逐渐建立起信任，也为后续合作打下基础。

如今，“王的手创”已在贵州、四川、浙江、云南、新疆、陕西、江西、湖南等地的乡村建设手工基地。从一件产品到一个品牌，王丹青认为，最难的是手工业生产的质量标准化建设。“乡村手工艺人的技艺水平扎实，但他们的创作多依赖个人经验与主观判断，这与供应链‘稳定、可控’的要求存在矛盾，会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，影响品牌口碑。”

如何解决这一问题，王丹青总结为“定标准”和“强落地”，以刺绣为例：首先，和绣娘制定手工业生产的具体标准，明确质检要求；其次，对新合作的手艺人开展系统培训；最后，在生产全流程中做好质检。“这一套流程，是从单个非遗品类扩展到综合供应链的关键经验。”

谈到品牌的名字由来，王丹青解释，“王”字源于甲骨文，汉代董仲舒说“三横者，天、地、人也；参通之者，王也”。“发展至今，对‘王’的解读已脱离权力象征，转而聚焦与人民紧密联结——这也是我们想传递给消费者的非遗形象：扎根生活、贴近大众的‘传统文化传递者’。”

孟璐璐和团队持续记录皮雕手艺人制作皮雕过程中的激情和微笑。“我要让他们知道，自己做的东西并不在周边的乡镇售卖，还可能到北京和上海，甚至出国门。我会把顾客的反馈告诉他们，他们很自豪，自己的手艺没有被抛弃，是被尊重的，自己是能为这个时代出力了。”孟璐璐说，“我们最想看到的，是一个‘精气神’提升起来的乡村振兴。”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谭思静

## 探源者说

# 从红薯窖掘出汉王陵 中国考古从“挖宝”到“读史”

## ——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三十周年记



①1995年1月，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墓主墓前考古发掘现场，左上为葛明宇。



②2019年，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现场全景鸟瞰。



③葛明宇正在检查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库房兵马俑。



④1995年3月，葛明宇正在发掘清理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墓室遗物。



⑤1995年，狮子山西汉楚王陵考古发掘现场一角，清除淤土后暴露的玉器。



⑥1995年3月，葛明宇正在发掘清理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墓室遗物。

“主墓室门开启的那一刻，我们都惊呆了！满眼都是玉器，玉片、玉璧、玉衣残件，铺满了整个墓室，几乎无从下脚。”回忆起30年前的情景，江苏省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馆长、研究员，狮子山西汉楚王陵考古发掘亲历者葛明宇的眼中，依然闪烁着兴奋的光。

1994年12月，22岁的葛明宇作为考古队最年轻的成员，参与了这场期待已久的考古发掘。当他沿着56米长的墓道缓缓深入，手电筒的光束在黑暗中照亮的是一个令人震撼的“玉器世界”。

“光金缕玉衣的玉片就将近4000片，大型玉璧直径超过30厘米。可以说，只要器型完整的玉器，几乎都能达到一级文物标准。”葛明宇说，“这种震撼的考古初体验，让我更加确信自己选择了正确的人生道路。”

狮子山楚王陵是一座特大型的西汉王陵崖洞墓，这座陵墓因山为陵，凿石为墓，墓体开凿入山体内部达100多米，建造奇绝，结构复杂，包含12间功能各异的墓室。其陵墓建造、墓葬规制与葬制理念，在汉代诸侯王墓中极为罕见。

陵墓中出土各类珍贵文物2000余件(套)，包括有4000余片和和田玉穿线而成的一件金缕玉衣，以及目前发现最精美的一批汉代玉器，200多方西汉楚王国的实用官印，数十万枚汉代“半两”铜钱，大量的金铜器和铜、铁兵器等，填补了汉代文物考古的许多空白。此外，其墓室身份的学术争议，也持续推动着对汉代王陵制度和西汉楚国历史研究的深入探讨。

## “走上考古这条路是再自然不过的事”

受家中长辈和传统文化的影响，葛明宇从小便对历史文物有着极大的兴趣，“我觉得自己走上考古之路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”。后来，他考上了复旦大学文博专业。那时除了上各类专业课，他最期待的就是每个周末跟着老师同学去上海的古玩市场“淘宝”。

“那时，我们最喜欢去古玩市场淘旧钱币。卖货的人常常扛着一麻袋的钱币过来摆摊，我们就从里面翻找，一个钱从两毛到一块钱不等。我在里面找到过‘永乐通宝’‘雍正通宝’等币种。”葛明宇说，“别小看这些小小的钱币，要想淘到‘真宝贝’，它需要你了解每个历史朝代的年号，古代钱币的各种版式、样式等各个方面。这个过程不仅锻炼了眼力，更重要的是获得对古物物的感性认识和鉴别能力。”

葛明宇非常佩服故宫博物院的耿宝昌先生，“耿先生是被文博界誉为‘人间国宝’‘中国古陶瓷鉴定第一人’的泰斗级人物。一堆没有标签、没有年代记录的碎瓷片，他用眼睛看釉色、摸胎质、辨纹饰，从蛛丝马迹里抠出文物的‘出生证明’。这种能力是许多文物鉴赏人的一辈子追求。”

因为对历史文物执着的热爱，葛明宇在毕业分配时作出了一个在旁人看来颇为不解的决定——放弃留校读研的机会，前往徐州参与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发掘工作。

“我的班主任陈宏京老师希望我留校读研，但我听说江苏徐州的王陵发掘项目，就毫不犹豫地来了。”葛明宇坦言，“作为一个考古人，一生能参与一次古代王陵的考古发掘是极其难得的机缘。这也是我一生的幸运。”这个选择，也与他深厚的乡土情结有

关。葛明宇的家乡徐州沛县，是汉高祖刘邦的故里，他与时任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馆长的王恺亦是同乡。“王恺老师和我家是世交，他对我说‘你要想来，我就带你’。”从此，葛明宇踏上了与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相伴半生的考古之路。“这成为我考古生涯中第一个、也是最后一个王陵发掘项目。”

## 10年坚守，楚王陵重现于世

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发掘，是一条充满坎坷的探索之路。从1984年徐州砖瓦厂在狮子山西麓取土烧砖，挖出一处汉代兵马俑坑，到1994年正式发掘，整整10年间，考古队经历了无数次的希望与失望。

为什么狮子山上的王陵这么难找？葛明宇解释：“这与徐州特殊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。徐州地处江苏省西北部的山东丘陵延伸地带。这里虽然属于黄淮平原，但实际上是个‘冈岭四合’的地方，全市有400多个小山头。这些山体的原生土层很薄，不到一米，下面就是坚硬的岩石。”

在这样的困境中，王恺异常执着。葛明宇记得，他经常独自一人狮子山上摸索，或到周围村庄里与村民聊天，寻找线索。即使在无武之地，我们的勘探工作必须另辟蹊径。”葛明宇说。

从1986年开始，考古队先后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科技考古实践。“第一次是在1986年春季，请求当时的煤炭工业部地质普查大队帮助，他们带来刚从美国购进的

微重力仪帮助查找；第二次在1987年，由中国矿业学院北京研究生部教授守书年出面组织，邀请了10个省市的30多位有实践经验的科技专家，动用了先进仪器再次勘探；第三次科技寻墓在1990年春，江苏省地震局的张治天等8名地质专家来到徐州勘墓，进行了仪器探测。”葛明宇说，“这无意中成就了现代科技考古的开端。”

然而，这些在当时堪称前沿的科技手段并未取得预期效果。“一方面是当时的技术还不够成熟，另一方面是狮子山特殊的环境干扰——整个狮子山山坡上有400多户民居，家中的电视机、无线电、铁制农具等，都会对探测设备产生干扰。”葛明宇说。

更让考古队感到压力的是学术界的质疑声。“当时有学者认为，狮子山发现的汉兵马俑，可能只是汉代烧制陶俑的窑厂，而不是王陵的陪葬坑。”葛明宇回忆，“因为在此之前，除了秦始皇能用庞大的地下兵马俑军阵陪葬之外，大家都认为其他帝王陵都没有发现兵马俑，徐州更不可能。”

在这样的困境中，王恺异常执着。葛明宇记得，他经常独自一人狮子山上摸索，或到周围村庄里与村民聊天，寻找线索。即使在无武之地，我们的勘探工作必须另辟蹊径。”葛明宇说。

转机出现在1991年的一次寻常交谈中。一位村民无意中向王恺提及，狮子山南坡有户人家挖了几个“大红薯窖”，每个窖能存放两三万斤粮食。“这句话听着平平无

奇，但在我们考古队员听来犹如惊雷！”葛明宇至今回忆起来仍显激动，“山体上都是石头，哪来这么多土？怎么能挖出这么大的窖？这背后一定有问题！”

考古队立即在红薯窖周边布设探沟，很快就在第二条探沟中发现了人工开凿的石壁。当看到那些整齐的凿痕时，王恺激动地说：“找到了！”

1994年11月4日，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了狮子山汉代陵墓的发掘，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启动。作为最年轻的队员，葛明宇承担了多方面的工作。“晚上要在工地值班，看守发掘现场；白天还要进行考古绘图和器物的发掘清理，有时候还要帮忙做饭。”

考古队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。葛明宇回忆：“那时，狮子山还属于城郊，交通不便，一天只有两班公交车通往市区。我们住在村民家的两间土房里，用煤球炉自己做饭。最常吃的就是面条，因为做起来最快也最简单。”

艰苦的条件并没有消磨他们的热情，在清理墓室的过程中，一个个惊喜接连出现。最让葛明宇印象深刻的，是楚王骸骨的发现。“盗墓者将玉衣拆开后，把楚王的遗骨随意丢在棺床旁。我们仔细清理出头骨、下颌骨、腿骨等，发现牙齿保存得特别好。我用牙刷小心清理牙齿上的泥土，还能清晰看到牙釉质的光泽。这为我们推断墓主人的死亡年龄提供了重要线索。”

值得一提的是，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

毁，“我们曾经发现过带有文字的竹筒，但是出土后十几分钟就碳化消失了。如果放在今天，我们一定会采用原址密封、实验室开启的方式，最大限度地保存这些珍贵的历史信息”。

在葛明宇看来，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发掘历程，折射出中国考古从“挖宝”到“读史”的深刻转变。“过去的考古工作更注重珍贵文物的发现，而现在我们更关注遗迹现象背后蕴含的历史信息。考古学的目的不是把精美的文物放进博物馆展柜，而是通过实物资料复原古代社会和历史事实的方方面面。”

这种转变在对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研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。“我们现在知道，狮子山不是一个孤立的墓葬，而是一个完整的陵园体系。通过后续调查，我们又陆续发现了楚王的王后陵墓、妃妾陪葬墓群、楚国王室成员陪葬墓区、楚王陵区大量陪葬器物坑群、陵寝建筑等遗址遗迹，这些都是理解汉代诸侯王陵及其葬制的重要考古资料。”葛明宇说。

## 让沉默的遗址说话，让深埋的文明重生

关于墓主人身份的学术讨论，葛明宇在汉文化论坛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：“结合西汉楚国历史、楚王世系，以及狮子山墓葬形制、出土文物等综合分析，我认为墓主人极有可能是汉景帝三年参与发动吴楚‘七国之乱’的第三代楚王刘戊。该墓工程浩大，但在建造上表现出一个显著特点，就是有着非常明显的没有开凿完工，即匆匆埋葬的迹象。这与当年楚王刘戊叛乱后非正常死亡和匆忙下葬存在直接关系”。

不过，徐州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所长刘照建在论坛上提出了不同看法：“结合狮子山楚王墓选址优越性、墓葬形制原始性，以及随葬器物规格之高、安葬礼仪之隆重等特点，该墓墓主为第一代楚王刘交的可能性最大。”这种学术争鸣，也正体现了汉代考古研究的活跃与深入。

2024年1月，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(省文物局)确定狮子山楚王陵为江苏省首批省级考古遗址公园。对于狮子山西汉楚王陵未来的保护与利用，葛明宇有着许多期许：“目前，楚王陵出土的珍贵文物大多收藏在徐州博物馆，与遗址本体分离，这不利于观众对楚王陵的整体理解。我们希望推动建设狮子山楚王陵遗址博物馆，让分散在各地的出土文物能够在原址环境中展示。”

葛明宇还希望能够以狮子山西汉楚王陵为代表，推动汉代崖洞墓的联合研究和保护。这种在对岩石中开凿墓室的葬制，在全国多地都有发现，如河北满城汉墓、山东曲阜西汉鲁王墓、河南永城西汉梁王墓、广州西汉南越王墓等。“大运河、丝绸之路等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，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。汉代崖洞墓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遗存，其研究价值和保护意义应该得到更多重视。”

作为亲历者，葛明宇深切感受到考古学与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。“现在强调‘让文物活起来’，要求我们不仅要做好考古发掘和研究，还要做好成果的阐释和传播。这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考古人的新使命。”回顾30多年的考古生涯，葛明宇说：“考古是对未知的探索，永远给人期待、给人希望。从当年那个趴在墓室里清理玉片的年轻人，到今天致力于遗址保护利用的博物馆馆长，我始终坚信，考古工作不仅是在发现历史，更是在创造历史——通过我们的手，让沉默的遗址说话，让深埋的文明重生。”

本文图片均由葛明宇提供

本文图片均由葛明宇提供